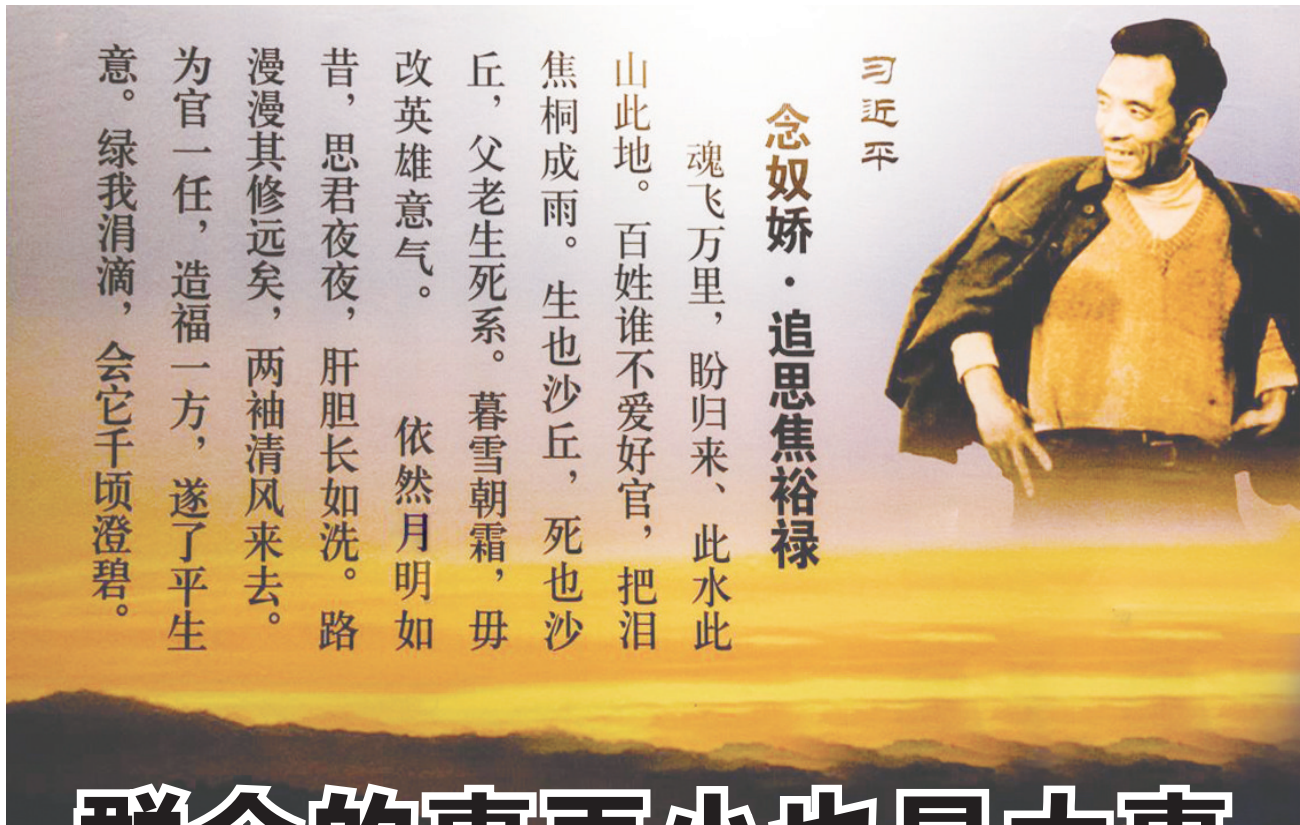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 王成国

近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组织我们集体观看了电影《焦裕禄》，虽然已观看过多次，但再次观看，心灵仍受到震动，又一次被焦裕禄那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特别是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更具现实的教育意义，需要我们认真的感悟与学习。

群众的事就是大事。焦裕禄同志刚到兰考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时，发现火车站救灾物资堆积如山，而当地灾民却得不到及时救济，大批逃荒。负责发放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长吴荣先却坐视不管，整天正忙于接待工作。焦裕禄主动率领县委干部去火车站卸货、发货，将救灾物资发到群众手中，确保灾民得到救济。这充分体现了焦裕禄同志把群众的事作为最大事的执政理念，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群众之事无小事、群众的事就是大事的思想认识，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群众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影片中焦裕禄和吴荣先之间的一段对话发人深省，焦裕禄说衡量工作的标准是否让人民群众满意，而吴荣先却表示既要让群众满意，更要让党满意。焦裕禄反驳道，人民满意的事，党会不满意？吴荣先“既要让群众满意，更要让党满意”的言外之意是党有党的利益，人民有人民的利益，二者是不一致的，并且党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二者是一致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是统一的，对人

民负责是最好的对党负责，对党负责要通过对人民负责来体现。

心中有群众，群众心中才有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把群众的事办好办实，让群众受益。焦裕禄同志就是因为把群众之事当回事，才在暴风雨的夜晚忍着病痛前往一线查看灾情，带领村民开展自救，并四处调研寻求“三害”治理之法。党员干部只有把群众之事当自己事一样来对待，才能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当得知养牛老人被牛撞伤，生命垂危想见他一面时，病重的焦裕禄不顾夜路，冒大雨前往探视。这就是焦裕禄同志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之事当自己事的具体体现。党员干部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会惦记他信任他支持他。当焦裕禄同志遭到诬告，面对组织调查时，群众自发为焦裕禄喊冤，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与群众同甘共苦。焦裕禄同志和人民打成一片，有汽车不坐，经常和工作人员骑车下乡，兰考一共有200多个村庄，他一年多走过了122个村庄。他的走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蜻蜓点水”，而是走到老百姓的炕头上，走到牛屋里，走到大田中。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深入一线访贫问苦、慰问群众、勘探风沙、查看灾情等事情，完全可以让分管领导，以及主管部门开展，自己作决策就行了。但是，焦裕禄却亲力亲为，给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为治理“三害”奠定了基础。他“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的思想，更值得我们深思。焦裕禄答应了小儿子想吃红烧肉的要求，但在回家的路上，他却把买肉的钱全给了一位

生病的群众。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焦裕禄和群众工作生活在一起，真正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也正因如此，焦裕禄做到了真实地接触群众、真正地了解群众的疾苦、培育了真挚的为民情怀。我们要学习焦裕禄同志真挚的为民情怀，真正地走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工作生活在一起，真正地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

群众评价是检验干部好坏的唯一标准。焦裕禄的工作被吴荣先误解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做花架子，甚至说是“有野心”，焦裕禄回答，“历史会给每个人一个公正的评价”。的确，历史给了焦裕禄一个公正的评价，“群众为书记申冤”“夹道送别”“自发送葬”等情节，都表现出兰考人民群众对焦裕禄的高度评价和真诚爱戴。正如赵专员所说，群众的评价是检验干部好坏的唯一标准。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自觉把群众评价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一方面，要敢于接受群众评价。敢不敢接受群众评价是检验干部践行宗旨意识是否到位的试金石。另一方面，要畅通群众评价的渠道。通过加大群众和基层考核干部的权重，引导干部为群众担当、向群众负责，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考核检验干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一班学员〕



说到鲁迅，便让人肃然起敬。毛泽东曾以“五个最”赞誉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文化建设时，毛泽东风趣地称鲁迅为我们的“鲁迅司令”。

战斗中的鲁迅，冷峻严肃，正气凛然。常使对手为之胆寒。生活中的鲁迅，亦师亦友，情重义浓。家书是不说谎的历史，是展现心灵的一扇窗口。捧读鲁迅家书，其人其事，其情其景，寓庄于谐，谐庄相生，你会感到一种别样的温馨。一位鲜活可爱的“愚兄”，仿佛就在我们身边。

鲁迅家书之“庄”

鲁迅家书之“庄”，关注时局变化，针砭世态炎凉，传播革命道理，指点作文要津，教以斗争策略，念念不忘孝道和护犊之心。质朴而纯真，丰富而多彩。

关爱进步青年，培育新生力量，是鲁迅一生的重要使命和担当。“‘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这就是进步。”“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这是1925年3月间，鲁迅给学生许广平（后来为夫人）信中的一席话。当时的许广平，作为北京女师大一位爱国进步青年，由于受时局所困和校园氛围之扰，一度滋生悲观失望情绪。鲁迅对其开导，为之解惑。并教以“壕堑战”的斗争方法和策略。预言“或发生反抗，为将来变动萌芽”。他在信中告知许广平，他正在为“找寻生力军，吸纳新人共同战斗”而行动。给爱将及一帮进步青年打气鼓劲。

1926年9月，鲁迅应聘到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许广平被邀到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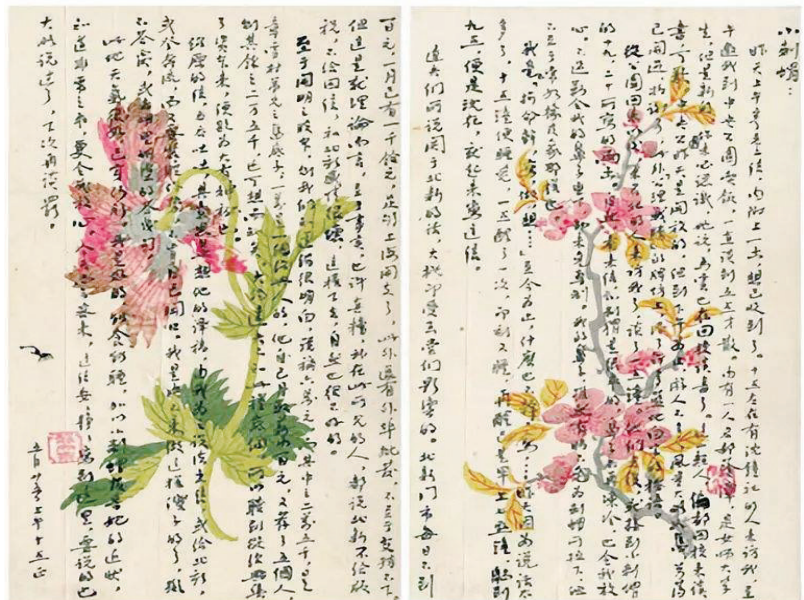
东女师大任教。这年俩人确认建立恋爱关系。虽是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已连在一起，书信往来十分频繁。有时几乎天天写信、发信、盼信。最多时一天写三次信。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展开了一场看似平平淡淡，实则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壕友”恋。书信中论时局，叙北伐，谈教学，言创作。相互嘘寒问暖，互寄思念，生生地将两颗火热的心不断碰撞。

1926年11月4日，许广平来信写道，准备“以一枝粗的手杖为武器，攻打敌党，有似意大利的棒喝团”时，鲁迅回信“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但发现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悲哀”。彼此间推心置腹，抒发情怀。

鲁迅是个大孝子。特别是对母亲鲁瑞，一直敬重有加，执孝子礼。据统计，1926年至1936年的10年间，鲁迅与母亲往来书信达220余封。此外，每年都抽出时间，到北平看望。老人一旦身体有恙，必床前侍候。自从与许广平结亲及至有了爱子海婴后，凡信必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开头，“男树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结尾。母亲牙痛了怎么治，胃不好如何调，气候变化怎样注意等等，信中都一一关询或回应。不时寄上孩子照片，有时随信寄海婴手书娘娘（绍兴方言，指祖母）或大人代笔的问候信附件。以使老人开心，免于挂念。

树人家书中的“谐”

树人家书中的“谐”，生动活泼，意趣横生。其诸词用语，别具一格，有时超乎想象。尤其和许广平之间。1925年3月至5月间，鲁迅和许广平以师生关系相处时，信的抬头皆用“广平兄”，落款署名“鲁迅”，中规中矩。进入6月份，成了师生关系，称谓发生变化。起首仍是“广平兄”，信尾则以“迅”“老师”署名。老师加引号，意思别那么生分。后来随着相互之间信任的不断加深，有时则借用许广平来信中的“迅”“愚兄”“哥儿”等署名回应。显得愈发随和、亲热。待到两人婚居，尤其是1929年5月许广平怀上了孩子，很快迎来了爱子海



『庄』与『谐』

□ 朱广联

婚后，信中称谓及信文表达便新词迭出，脑洞大开。“乖姑”“小刺猬”“小莲蓬而小刺猬”“哥姑”“哥姑！小刺猬”等频繁出现。鲁迅自己署名则为“象”“白象”“你的小白象”“哥”“L”等，怎么高兴怎么称，怎么有趣怎么署。还有多次落款为“H·M”或画个“害马”图。鲁迅这是故意借用了许广平绰号“害马”的拼音缩写，与之调侃逗乐。

信文中，也常见鲁迅玩幽默，寻开心。1925年6月28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以“训词”开头，以“老师”落款。信中写道：“你们这些小姐们……为掩饰逃走起见，则云‘想拿东西打人’，辄以‘想’字妄加罪织。呜呼，‘老师’之‘前途’，而今而后，岂不‘棘矣’也哉！”展现其可爱的一面。1929年6月1日凌晨3时，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我也对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但有时也觉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小米（小刺猬吃的）、棒子面、果脯等，昨天都已买齐了。”这是鲁迅到京探母即将返沪前写的。拥有爱妻，喜得贵子，升级为父，他“嘍瑟”并开心。一次，鲁迅与母亲交谈，随口说出海婴为“小狗屁”被母亲教育，不许这么叫。鲁迅当面答应，掉头还是“小狗屁”。这就是生活中的鲁迅。

品读鲁迅家书，字里行间，“庄”得大气，“谐”得生趣。既袒露心胸，又不失分寸。这是一种艺术，一种智慧，更是一份情怀。在鲁迅看来，战斗是艰辛的，坦然面对；生活是美好的，以心追寻。一对革命伴侣，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风雨同舟，相互依恋，不离不弃，厮守终身。鲁迅的家书，尤其其人生一样，庄重而浪漫，历久而弥新。“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卷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这正是今人及后辈值得品味和感念的。

陈忠实：文学依然神圣

□ 耿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正是大部分文人考虑要不要下海的时候，陈忠实却在焦虑身后尚无长篇能做枕头这个问题。他对自己追求的目标一贯清晰又执着。他曾在高考落榜时发誓要在4年内发表人生第一篇作品，结果2年内就实现了这个目标。1978年他调入县文化馆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将创作视为事业，于是在一年内就发表10余部短篇小说和小特写来迎接文学春天的到来。一如这般对时间节点如此看重并且时不我待玩命追求理想的陈忠实，在即将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大关时，他对尚无长篇巨制这个缺憾愈加惶惶不可终日。

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他在闭关的老宅中展开了与黄土地上祖先们的灵魂对视。他要表现新旧中国在激烈碰撞中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坚守、挣扎与更新。历经6年的酝酿、思考、写作和修改，1992年《白鹿原》一经问世即轰动文坛，并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个事件见证了现实主义在消费文化、快餐文化中脱颖而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作家凭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信，作出甘于寂寞、傲骨卓然的姿态为整个当代文

坛树立了标杆。

回看陈忠实和《白鹿原》，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巨变。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过去的10年里，个体私营经济经历了观望，试探和雨后春笋般跃跃欲试的过程。而人们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看法也由嗤之以鼻到拭目以待，甚至一往无前投身尝鲜。这中间有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血本无归，领略到铜臭对灵魂的腐蚀，而有的人也摇身一变走向成功，挥金如土成为新贵。然而无论如何，社会整体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让人们感到搞活经济带来的巨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摆在了面前，社会各个阶层的差距逐渐拉大，人们的价值观因各自生活的不同开始分野。人们期待一切社会风气均朝着务实和实效迈进。面对这种现实，作家该如何表现？

陈忠实就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他担当起职业作家的责任，并且少年时期他就种下的作家梦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要选择在此时结下最大的一个硕果。他这样做的目的似乎不仅要向世人证明文学不但在任何时刻都能有所作为，尤其现实主义文学更能

焕发民族内在深沉而有力的自信。这是来自文化根性的沉着和豪迈，足以提醒行得再远的人也必须要保持一份操守和气节，用人格的完整抵抗变幻莫测的世间万物。

在青昧现实诱惑还是坚守理想信念这两者之间，陈忠实坚定地选择后者。他自称见多了被文学蛊惑感的人，最终即使穷困潦倒而文学梦却丝毫不减。这似乎是当年他立志在关中蒲河老家闭关写作时的一种内心隐忧。我们可以揣测他是在跟自己下赌注。赌的是自己对关中文化的判断力，即黄土地上孕育的文化火种不足以唤醒躁动不安的世人心灵，让他们保持沉静不致迷失。他隐约觉得是时候有一部长篇要担当起这个社会责任。陈忠实一如柳青选择皇甫村，他被《创业史》的深邃和高屋建瓴深深折服。他要继承这位精神导师开辟的道路，扎根乡土，用厚重的史诗给当时浮躁的社会注入沉静和深刻。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魅力以及黄土地悠远深厚的精神资源给了陈忠实不改初心的坚定和执着。

所以，现实主义在陈忠实这里有了特殊意味。他没有如路遥一般

直视改革现实中乡土中国出现的问题和人性的复杂多变。虽然，陈忠实在新时期创作了多部现实改革题材的农村小说，而长篇却一反常态，打破常规路数，要从白鹿原上的父辈甚至更为遥远的祖辈那里获取更多问题的深层答案。用他的话说就是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一旦对现实生活有了生命哲学的认知厚度，故事本身就成为一个载体而已。形成这种见解的陈忠实坦陈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给闭关中的自己带来的眼界上的开阔。但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讲述方式显得更为至关重要。他找准现实问题，却并不急于用现实故事讲述。他从黄土地上普通祖辈的身上讲起，用他们承载着民族传统和精神精髓的故事回答今天的问题。因可以说现实主义在陈忠实这里完成了一次“升级”。但其精神与当代传统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现实主义文学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就在努力追求干预生活的能力。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发现问题，并通过文学世界呈现解决问题的决心、能力和方法。然而这种创作原则一度陷入对理想现实的绝对追求，

反而丧失了表达真实的能力。新时期“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是书写社会问题的急先锋，并打出文学是人学的一面旗帜，让现实主义回归了直面社会问题的本质。很快，寻根文学要求从文化深处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却让陈忠实发现寻根文学的归宿并不明朗，“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他用《白鹿原》解释了现实主义的社会功能与文学讲述初衷必须达成一致。依托真实原型虚构出来的白鹿原上的祖辈们在现当代中国空前巨变中作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历史的选择和文化的归宿。这就使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有了更为艺术和更为深邃地呈现和表达。

无论是陈忠实本人选择固守坚守“文学依然神圣”的信念，还是他付出极大的心血给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升级”，无一不在表明当代作家将国家发展、民族奋进的思考融入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中。陈忠实这种对人生理想接近苛刻的努力追求，对现实世界高度关注的社会责任感在今天依旧光彩熠熠。

